

老建筑焕发新生机

□ 李丹

7 星期话题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许多具有文化价值的老建筑正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在加快发展脚步的同时,我们是否该停下来思考一下:如何“盘活”这些珍贵的建筑遗产?如何在保护古建筑的同时,让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享受更好的生活?



博物馆之旅

走进位于江苏南京市云锦路上的云锦博物馆,满目尽是繁华。

金代的齐王金子袍,大量运用金银线;一件明代的十二团龙袍上,分别有两条过肩龙,前胸后背四条正位坐龙,两条侧位升龙;清代的童子攀枝花缎,每一个童子的肚兜和每一朵莲花,造型和颜色都不同,为了呈现“逐花异色”的效果,这些图案只能由手工织造,而不能用电脑复制。

南京的云锦,是在元代织金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了明代,又进一步创造了加金“妆花”锦缎新品种,有了库缎、织金、织锦、妆花4个种类。因为用料考究、技艺精湛、花纹精美,人们说它像天上的云霞般美丽。所以,南京生产的各种提花丝织锦缎,晚清以后就被统称为“云锦”。2009年,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大花楼木织机,则传承了云锦制作技艺中最原汁原味的部分。

在云锦博物馆二层,游客可以看到10台正在运作的大花楼织机。这种高4米、长5.6米的织机,有1924个部件,分为上下两层,挑花工坐在上层负责提拉棉线,织手坐在下方织机前负责织丝线。

上面提拉一根棉线,下面立刻就知道在什么位置用什么颜色的丝线。讲解员说,挑花工相当于解码的程序员,而织手就像在电脑屏幕前编图。我请教有30多年经验的织手胡师傅,这种转换是如何实现的?正在织一幅《幽兰图》的他却笑称:有口诀,不可言说。

将这个“不可言说”的问题抛给讲解员,她告诉我:锦料织造前,必须先设计图案纹样,纸面上设计好的纹样,过渡到织物上去,就需要用到最关键的一环:挑花结本。这或许就是胡师傅所谓的“口诀”。

那到底什么是“挑花结本”呢?为了找到答案,我来到位于云锦博物馆五层的南京云锦研究所,在艺术总监郭俊的大师工作室看个究竟。

南京云锦博物馆

再现历史的繁华

□ 陈莹莹

郭俊将一张《孔雀图》纹样设计稿,先填绘成放大的意向图。意向图上的1大格分为8小格,对应8根丝线,和地球上每一个位置都有固定的经纬度一样,这张图上的每一点,都有自己确定的色彩。

郭俊的学徒将意向图放在架子上,制作挑花结本。她用一条竹签子串起同一根纬线上所有标为金色的点,竹签之上的称为“浮”,底下的则称“潜”。同样,这条丝线上所有蓝色的点,也被一条竹签穿过,一条纬线上有多少种颜色,就串多少根竹签子。最后,用棉线抽勾,来代替竹签子的位置,将棉线打结。一个棉线疙瘩,对应着意向图上的一厘米左右的大格。工人打了多少棉绳节,就意味着在图纸上走过了多长的距离。

一般来说,一个工人一天能将意向图上的5个大格转换成棉线疙瘩。但遇到复杂的图,一天只能完成1大格。最后完工后,形象的图案变成了一堆棉线,就变成了挑花结本。其意义就是一个储存纹样信息和编织方式的U盘。每一根棉线,到了大花楼织机上就变成了挑花结本。有了它,师傅们才能织出《孔雀图》。

但是即便这样,工人在大花楼织机上分解挑花结本时,经过8个小时才能编织5厘米左右的云锦,可谓寸锦寸金。

在云锦博物馆专门的展示厅,让人得以一窥江宁织造盛极一时的景象:丁汝昌战袍上的鱼尾表示这是水师兵种,狮头说明是文官二品;苏州王锡爵墓中出土的绛红地八宝纹亮地花罗斗牛方补服,是皇帝的御赐;明代武官补上的走兽,文官补上的飞禽,都栩栩如生、繁复华丽。

展示柜中静默的华服,终因皇朝消逝而成为历史。在云锦博物馆一层的展销大厅,正在一番热闹景象。熙来攘往的人们正在欣赏和采购云锦制品。一方丝巾,一条领带,机制的两三百元,人工制作的上千元;一件旗袍、一个坤包,把这天上的云霞带进了万户千家。不再有皇室烙印,不再是泾渭分明的身份象征,但这些都亲民的云锦制品,也另有一番风韵。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编辑 张济和 何东宪

梁婧 教蓉

邮箱 jrbzmk@163.com

划”,既保存了历史建筑,将之合理利用,又可为小区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市民积极参与到历史建筑的保护中来。

法院变学校、警署成酒店、医院改文化馆,就连街角一栋不起眼的旧住宅,都变成了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的中医医疗保健中心。短短5年时间,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就实现了不小的突破,完善的机制是计划得以成功的关键因素。

实施过程中,香港特区政府首先在闲置的历史建筑中物色一些适宜做活化再利用的建筑纳入计划之内,邀请非营利机构提交建议书,建议的用途必须以社会企业的形式经营,并且在开业两年后能达到自负盈亏。同时,特区政府成立了一个由不同界别的官方及非官方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对提交的申请书进行研议及审批。

“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先后进行了3期,共完成12个建筑活化项目。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副局长雷洁玉表示,活化后的建筑不仅能够促进文化创意、旅游、艺术、中医药等产业的发展,而且在不影响企业经营的前提下,可以定期组织观众参观建筑的部分或全部,让大众对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产生更深层次的了解。

□ 杜绝过度商业化

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和利用,往往容易走两个极端:或是过分保护,只维护不利用,很容易导致建筑遗产的空置、衰败,这种被称为“冻结式保护”;还有一种是过度利用,将原本具有的商业价值过度开发,使游客远远超过景点所能承受的范围,从而使建筑因过载而产生不可修复的

产业园区,有的作为博物馆开放参观,有的用作休闲娱乐场所,这些做法都为建筑遗址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

以往,老建筑的再利用大多停留在“橱窗式”的展示阶段,很难带来经济效益,往往是政府投入资金维修后作为参观展览基地,而门票收入仅能基本维持日常管理,后续维修投入还需继续依赖政府。台湾文资专家施国隆认为,真正的再利用应该是在经济上能够永续经营,利用良好的经营管理,达到财务自主性。“建筑再利用应该是主流发展而不是另类时尚,是创造生机而不是解决遗弃,是潜力开发而不是改变空间,是功能多样而不是用途窄化,是设计美学而不是因陋就简……”施国隆对再利用的原则提出了这样几点要求。

对老建筑进行必要的维修时,除了遵循“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施国隆认为还需要遵循《威尼斯宪章》第九条的要求: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须与该建筑的构成有所区别,并且必须要有现代标记。

□ 新旧建筑和谐共存

保护有文化价值的老建筑,并不意味着要将其包围起来、束之高阁。对老建筑的维护与再利用,要使其能够与周围的新建筑和谐共融,共同服务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在这一点上,香港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一般的认识是老建筑大多难以保留,肯定是要拆掉盖高楼大厦了。然而,从2008年开始,香港特区政府推出“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

□ 旧房子一样能回收

废弃的脚踏车、不穿的旧衣服、喝剩的饮料瓶……,我们身边的许多废旧物资都能回收、分类、再利用。而旧房子呢?其实一样可以回收再利用。在建筑结构无虞的状态下,一些失去原有功能的老建筑,经过重新设计施工,就能另作他用,重新焕发青春。

“利用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组成部分,赋予文化遗产当代功能,能够促进文化遗产承载的文化传统的传承。”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舟认为。我们一直尝试将废旧建筑重新改造利用,如北京的“798”、上海的老工业遗址、天津五大道地区庄王府遗址等,有的用于文化创意产

七日

无论怎么变,纸媒的价值取向都不应变化:真诚行事,坚持原则,追随真相指引的方向。

在经历了连续7年的报纸收入下滑后,格雷厄姆家族终于在本周宣布了壮士断腕的决定:将美国《华盛顿邮报》出售给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索斯。至此,这家因“水门事件”而声名大振的大报结束了几十年的家族控制时代。

这让笔者联想到了另一则消息。日前,迎来30岁生日的台湾知名文学杂志《文讯》遭遇经营困难。无奈之下,《文讯》决定举行拍卖会,发动文艺界人士捐赠书画,拍卖筹款。台湾文艺界人士纷纷响应,短短几个月

要生存 不能苟活

□ 章木扬

就捐出了600多件私人藏品。《文讯》现任总编辑封德屏说,承载了如此丰厚的馈赠与期待,哪怕是只能再多走大半日、多走一里路,都是甜蜜幸福。但在旁人看来,这甜蜜幸福中,着实五味杂陈。

在网络时代的残酷竞争中,纸媒的生存遭遇了极大挑战。生产严肃内容、坚持价值标准,越来越成了一项入不敷出的活计。在商业力量的冲击之下,报纸杂志的历史与操守显得不堪一击,纷纷走向凄惨的并购或者悲壮的募捐。这个时代到底怎么了?

首先当然是媒体变了。信息传播日益迅捷,读者对时效的要求越来越苛刻。而时效是新兴媒体的特长,却是严肃纸媒的短板。日子一长,报刊拥有的读者逐渐转投他途。和网络、手机、电视比起来,报刊这种过去的大众媒体显得小众了。

社会的心态也变了。扎实的细读已经落伍,现在流行的是一目十行的娱乐性浏

览。这其实不新鲜,严肃的内容经常会落到大众的视野之外,远的不说,稍稍翻翻元朝和明末的历史就能看到同样的境况。可如今的不同在于,娱乐的内容汗牛充栋,真正享有大众媒介地位的媒体,也手握钞票和高科技,一股脑地向娱乐奔去,以此与竞争对手争夺大众的关注,以及更多的钞票和更新的高科技。有了高科技,读者的所有时间都被占据。即使是在等电梯、坐地铁、排队长的碎片时段,人们都被各种电子屏幕包围,“静下心来”阅读的机会也就渺茫了。

在这样的时代里,难道纸媒已再无生存空间,读者已无需深度了么?恐怕也不尽然。娱乐可以祛除精神疲惫,但不能助人抵达宁静;科技可以提升效率,却无益于明心见性。时间是一把锤子,会敲碎所有易碎品。等一切喧嚣散尽,只有那些更有分量的才会留下来。杰夫·贝索斯说,格雷厄姆家

族的两类勇气,我希望能学习。第一种勇气是,他们会说:等一等,要确认,不要急,再找个信源,因为新闻报道关乎实实在在的,人和他们的声誉、生计及家庭都利益攸关;而第二种勇气是,他们会说:追踪报道这件事,不管代价有多大。《法兰克福汇报》的发行人之一弗兰克·席尔马赫尔则认为,一份好的报纸要能“为网络媒体的新闻狂躁降温”,并“破除其程式化的模式”。

无论搞不搞募捐,换不换老板,纸媒都会踏上改变的路。诚如杰夫·贝索斯在对邮报员工的信中所说,我们面前没有一份地图,指明一条前进的路径也并不容易。我们需要发明创造,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实验。但无论怎么变,纸媒的价值取向都不应变化:真诚行事,坚持原则,追随真相指引的方向。

报利要生存,但不能苟活。惟此,才有恒久的可能。